

编者按 钱冠连教授是我国语用学、语言哲学和美学语言研究的先驱者，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其无论是学品还是人品，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2014年7月，恰逢钱教授75华诞，《当代外语研究》为了表达对钱教授的敬意和祝福，特辟学术纪念专号。现予以部分转载，以飨读者。

当代外语研究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A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Professor
Qian Guanlian on His 75th Birthday

06

2014

(总第402期)

❧ 思在菩提树下——我问学的今生今世

❧ 贺钱冠连先生七十五寿辰

❧ 论钱冠连学术思想的脉络及其价值

❧ 语言研究的智慧与方法——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和“钱冠连的绳子”



ISSN 1674-8921



06>

9 771674 892116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当代外语研究》庆贺钱冠连先生75华诞专号寄语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

2014年7月, 恰逢钱冠连先生75华诞。《当代外语研究》为了表达对钱先生的敬意和祝福, 特辟学术纪念专号, 这是学术期刊对学术的尊重, 对学人的褒奖。

钱先生为人, 勤奋务实, 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与坚持。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 先后在湖北省恩施第一高中和高寒的山区咸丰师范学校工作过, 后于鄂西大学任教, 直至为《现代外语》主编张达三先生青睐, 调至广外工作。60岁之后, 经过严格的程序获聘博导, 仍继续执教、研究于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先生种种走出低谷、攀上高峰之举, 必与其执着坚定的性格密切关联。先生曾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 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是酸是甜, 我自个儿慢慢品尝。对此, 他进一步阐述为: “这一辈子, 工作能做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愿意不断地超越自己, 但从不拼命, 不垫起脚来充高个儿。如果我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 实在是够不着了, 我就走开, 走开的时候, 我也不说葡萄是酸的”。正是因为懂得取舍, 懂得为自己设立一个个既不卑近又不惊远的目标, 终能修成“正果”。先生极为看重人品对学品的影响与渗透, 这一点从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遴选中可见端倪。他认为人生有三宝: 快乐、智慧、创造力。“只要怀有淡泊的心境和一生一世永不放弃的追求, 就定能获得生活馈赠的那份欢乐。”

先生为学, 另辟蹊径,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传道解惑之路。他在语言理论、语用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独特见解及学术思想影响了整个学科的发展。他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推崇“创造性的工作”, 是学生们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研究外语, 认为首先要学好母语, 有了扎实的汉语语言文化基础, 才有条件做到“学贯中西”; 他藏书颇丰, 心情不好时往书房里一坐, 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阅读中, 先生广泛涉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天文、文学、美学、艺术以及系统论等等门类的知识, 使得其做研究往往能从语言学和语用学之外的角度, 不断发现新课题, 形成新观点。先生是我国最先在国外语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 他的学术专著《美学语言学: 语言美和言语美》在国内外都属创新学科。先生的语用学研究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其著作《汉语文化语用学》是中国第一部以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 书出之初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 被国家教委列为研究生推荐书目。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 称其具有“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王宗炎先生认为“在这些(语用学)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 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地位”。先生的每一个成就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积之厚厚, 从容薄发”的执着与坚持所修成的正果。

先生虽然年逾古稀, 却老当益壮, 正所谓“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我们衷心祝愿钱先生这棵学术大树, 繁花似锦, 播撒乾坤!

思在菩提树下

——我问学的今生今世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10)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4)06-0001-04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6.001

佛说:“你们的心上有尘。”这个心上之尘,实际上是人的欲望。我相信,求生之欲不可灭,求奢之欲不可有,非分之求不可生。可是,神秀(公元606~706,唐代高僧,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创始人)眼里有万物,当然包括有尘埃。是尘埃,就能擦掉。他就主张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尘埃是你惹来的,该你擦掉。慧能(公元638~713,禅宗六祖)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金刚经》里的“菩提”为“觉悟”、“觉解”之义,与作为“菩提”树名的“菩提”不是一回事,故窃以为六祖说“菩提本无树”也是对的,一语双关了。)慧能站在了哲学的唯心派(本来无一物)这一立场。王阳明也主张,你心上有一物,那物就有了。现代的欧陆派哲学家海德格尔另有主张:一物有了名字,那物才出场。这样,作为工具的语言,一下子就上升到作为存在的居所的语言。

说来也怪,我在植物繁茂的广东多年,还去过著名的南华寺,就是没有看到过菩提树。那里应该有啊,但没挂牌自报树名,我便有眼无它! 2012年之前,我讲学、开学术会议,参观过不少地方了,就是没亲眼见过菩提树。

在覃修桂教授(后来成为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力邀之下(这里有王寅教授建议以“软引进模式”推荐之功),做了种种工作,我被该校该院特聘,在那儿工作了一年(2012年9月~2013年8月)。因为精气神不够,受到覃院长多方照顾,一周内上课时数仅为一小时的西方语言哲学课程,另外,给四个年轻博士的研究提点建议。有了那么多闲工夫,便在美丽的校园内到处走动。这样走动走动,就发现了菩提! 在图书馆大门两边,一边一棵树,每棵树下匍匐着一块橙黄色的刻名之石,上书三字:“菩提树”。

作者简介:钱冠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专职研究员、二级教授、西方语言哲学与语用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刊《语言哲学研究》主编、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首届(四年)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电子邮箱:qianguanlian@163.com

菩提树为桑科榕属植物,树干由几株小干叠嶂缠绕,骨力中藏,树皮为灰色。独特的是树叶:典型的人的心脏之状,叶面的尖尖伸突出一寸甚至两寸多长,尤为称奇。有些地方称其为“佛陀树”,这样取名,显然与释迦牟尼在树下修炼悟道找到正觉(菩提)有关。有这点先在的知识,我和夫人黄朝琼(她有一次指着书上的“苦到极点就到了菩提处”的句子给我看)围着两棵菩提树各绕行了三圈。此后,夜眠心有不宁时,只要一想起我在菩提树下绕了三圈的情景,便立即安宁,渐渐入眠。这是我和菩提树有先在的亲合力之缘分啊。

既然《金刚经》里“菩提”为“觉悟”、“觉解”之义,那么,所谓“思在菩提树下”,不就是在菩提树下讨论对自己人生的觉悟与觉解吗?——菩提树下论菩提是也。下面就是我对自已今生今世问学做人的觉悟与觉解,略记如下。

1. 我的幸运

(非我主观努力、目标明确、
靠眼光与定力争取到的东西)

第一,童年玩得很痛快。感谢我那文化层次相当高的父亲(做生意)不约束我。我在各种各样的游戏中,发育了大脑,培养了与人配合的社会意识和组织能力。这是我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相信每个孩子都有一份天才与特殊才能,在无约束状态下便可得到释放与发扬。不幸的是,有些家长的过度约束摧毁了这份天才与特能。天才与特能中孕育了求生的绝招。什么是好的教育制度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发掘孩子(大学生也只是孩子)天才与特能。什么是坏的教育制度的典型特征? 限制与扼杀孩子的天才与特能。当一个人的绝招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且该绝招的不可取代性很大,就是找到了他的干净的财富之源,好名誉之源。

第二,在青少年时代,初中、高中有大量的时间阅读课程之外的许多好的读物(主要是科学家及伟人传记与国内经典文学名著);在大学时代,我按书

单系统地读了世界名著,这使我意识到,读书、思考、欣赏艺术与欣赏大自然是愉悦的,这导致我中年认识到,这四大项是人生重要的快乐(还有更重要的快乐,下见第三节第五点、第六点及第九点)。对比之下,目前在初中、高中流行的过度约束——死背书、考试为牢、拼时间的驯兽式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死穴:搞坏了身体、扼杀了创造、挤掉了思考。庆幸我提前出世,躲过了这一劫!

第三,我当教师当到中年时(大约是1979年,湖北民族学院),好友汤贤均提醒我:“老钱,你上课可以把复杂的东西搞得很简单又有趣”,就是这一句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把我多年在教学中实践着但不明晰的一个观念,一下就转换成了一个清晰的命题:把复杂问题变得简明而有趣是教学的最高境界。走到这一步的内因在于,我从初中读书起,就喜欢比较研究各位老师上课的长处与短处。不过那时我梦想当作家,并未想到当教师,当然也就没想到什么教学的高境界。

第四,童年读书时,我注意到常有作者强调:不要只是重复前人,要有自己的创造。我记住了这句话。这导致了我后来写的四本专著、一本语言学自选集、两本散文集、各大学演讲、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传授经典作品除外),无一不是贯彻了这个宗旨:原创。于是,我的生命,通过我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原创性思想,得到了延长。如果这七本书(很可能还有一本)愿意,它们将来会自动为我离世送行,它们就是我的悼词,代替开追悼会,也省去了单位领导、子女及亲人、好友多少劳累!

第五,华中师大录取我读外语(最后一个志愿),我被迫丢了作家梦(前三个志愿是中文系,且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自信考得很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假如我真写起小说来,由于我“放不下”的脆弱心理素质,必然长期失眠,人早就没了,活不到75岁(而且还可以健康地活下去)。没当成作家,正是我的幸运!今生当教师为我带来了很多愉悦(下见第三节第九点)。在走厄运、无愉悦的时候,我记住了一句自我鼓励的话: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堵死你,你身旁还有一条活路,只是你还未找到它。

第六,大学三年级,我的学习安排重点由俄语转向英语。现在端的就是英语饭碗,就是这个英语,为我后来一生的事业——人可以没成功,但必须有事业——打下了基础。这不是因为我早知道中国与苏联即将分道扬镳,更不是提前知道以后我要教英语、要研究英文原版语言学专著与哲学著作,而是认为,不学两门外语不算学外语。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第七,在我一生的各个关键时刻与重要阶段,都分别得到了恩人、好人的帮助与指点。小学教师威

名儒老师的高水平启发式教学,影响了我;初中班主任欧阳鹏老师在我(因不懂事)伤了他的心的情况下没有报复我,使我顺利考上本地区最好的高中(如果他在鉴定和档案里做点儿手脚,我就考不上高中,下到农村,就失掉了问学的打基础阶段);教大学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张达三先生,《现代外语》原主编,于1989年(逢我49岁时)向当时的校长桂诗春先生与副校长黄建华先生推荐,在他们的认可与支持下,把我调入广外,改变命运之路真正开始了;陈楚祥先生(语言文化所所长)1993年在为我申请正高职称的事儿上几乎控制不了情绪(在不少人的共同关心下,问题最后恰当解决),这是在为别人的生存与发展争机会啊(可不是为了自己名利拍桌子打板凳)!后来我想,这些行动不也是使社会保持光明的一种支撑吗?徐真华教授(2000~2010年的广外党委书记兼校长)在我到了退休年龄时,坚决挽留我延教十年,我的主要原创性作品由此产出;王初明教授(首任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主任)力主让我担任博导(按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匿名审查我的学术著述;通过),让我教授西方语言哲学这门课,为以后的一项重要事业——语言哲学活动——开了个好头;现任广外的领导们为我安心休养并参加必要的学术活动创造了条件:校长仲伟合细心而周到地点燃了我的余热;在此,我还要感谢我七本书的责任编辑们(其中,《汉语文化语用学》责编宁有权和《语言全息论》及《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和语用学研究》两书的责编冯华英是他们的代表。其余责编恕不一一提及);我还要感谢两位杂志主编,一位是李洪儒教授,他以独具的眼光与魄力,在《外语学刊》上,开辟语言哲学专栏,培养了大批语言哲学学人,包括我。另一位是《当代外语研究》的主编杨枫先生(他早就预言莫言要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特邀我写一专文,我以拙文“思在昆仑山下:眼光与定力”交卷(2011年第10期),遂有后来网上转载。由于他更后的推荐,《眼光与定力》散文集面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学子传阅。……我不过是众人合力推上河坡的一块不那么规矩的石头。我想,一个好社会的标志之一是:需要帮助与救助的人能在最需要的时刻获得人们的帮助与救助。

2. 我的不幸

(1) 急性子,易冲动,不能忍。相信这是我的血质所致。到老年也改得不理想。急着做事,提早地成就了我许多正事,也使一些好事欲速则不达,伤了人家的心还不曾发现。令我迷惑,甚至感到神秘的是,我这个常常对家人和社会上的人与事发脾气的人,上课从不动怒,甚至文革大混乱时期也未曾在课

堂上动过怒。

(2) 敏感与忧虑同在。敏感(稍感即敏,稍感即觉)使人能快速地发现、理解并把握他所想认知的一切对象,显然有利于问学与事业,亦使人能及时地趋利避害;另一方面,敏感往往导致多疑,把小事、小问题夸大成大事、大问题,敏感遂成忧虑的源泉。——由一个原因生出两个互不相容的结果,用得适当是优点,用得不适当便是缺点。

(3) 母亲去世早,因而缺乏母爱。自己没尝过大爱与细腻之爱,就不知将大爱与细腻之爱赋予别人(尤其是赋予受教育的对象)。待人处事倾向于果断,果断就往往意味着忽略细致与周全。

(4) 文革十年不让读书,浪费了一辈子之中的黄金时段(26~36岁时段),损失不可言状也。否则,我的国学功底与英语文化会好得多!

(5) 追求成功与追求快乐的关系处理很不理想。直到身体健康透支到颈椎病爆发(是年66岁)才认识到,成功不等于快乐,受病痛折磨不是正常的人生。人生不是以痛苦为其目的。

(6) “我的不幸在于,以普通人的才干,以低于普通人的心理素质——拿得起,放不下——企图干很多的事情。我的幸运在于晚年终于认识到了我的上述不幸。于是,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们是“被”生下来的,不要拼命做许多事,做好一件事还不容易呢。”(2012年10月28日,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宁波会议上的会长卸任演说)

3. 几件做对了、做成了的事

(凭借眼光与定力做对了,而非乱撞)

一、在大学(1958~1962)期间,虽被内定为“走白专道路份子”,仍不放弃读书。当时很多学生怕戴上白专份子帽子,就主动不读书了。

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很多外语专业人改行了,而我守住外语不转行,才能在语言学、语用学、工具性语言研究以及语言哲学方面做出一些事情。

三、为汉语研究与外语研究这两张皮(吕叔湘的忧虑)的合成自觉地做了一些工作:以此为专题,曾在中国英汉对比研究学会上做主题发言,还发表过论文。《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及《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揭示的是关于所有语言的普遍原理,理所当然地考察了汉语;《汉语文化语用学》正是聚焦汉语文化。天不违人愿,这四部书的汉语界读者比外语界读者更多一些。另外,外语界朋友很少知道的是,拙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在《汉语学报》2004年第2期发表之后,2005年被《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按规定,学术年鉴是每年发表过去一年的学术大事记)大篇幅转载;该文

的核心段落“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又被教育部蓝皮书即《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引用,认为核心段落里的思想“很值得重视”,可以作为语言学界发展方向的一种向导。

四、在1995年前后(时年56岁上下),将主攻方向由语用学转到语言哲学。这为我最近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工作开辟了新路:将中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活动与事业普及并开展起来。

五、有真兴趣(使我感到内在的愉快与充实,且令我有安身立命的事业),有真信念(不随波逐流的处事做人原则)。活着,但不盲目。

六、从中年起,尝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快乐:首先是创造性写作带来的内心愉悦与骄傲;还有就是“五十五岁后,自修转攻西方语言哲学(有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思考习惯做基础),使我享受到世上为数不多的人能享受到的哲学的快乐体验,即 eudemonia(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由理性支配并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参见《眼光与定力》第70页)。这样,我便获得了深刻的快乐:精神上的丰富与宁静。

七、写了四部不重复前人的专著,写了两部(还即将出版一部)很动脑子的思考人性、人生与学术的散文集。

八、活得干净远比活得辉煌更有意义。窃以为,保持住人性不扭曲与内心的宁静,是要不要去争取一份利益的最后取舍标准。这个最后取舍标准,可以解释我在涉及三次高职(直到二级教授)、一次政府特殊津贴、两次重大课题立项、一次教委遴选研究生推荐书目、一次博导资格论证、两次专著获奖的评审活动中,长达22年跨度,我未曾动过送礼、托人情、打招呼的念头,颇感欣慰。(据《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自序稍有改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九、对得起我的饭碗(为稻粱谋:教书)。我相信学生从我的课堂教学中得到了一些营养;作为回报,我得到了应有的稻粱,另加愉悦。讲课50年,上课铃响人已上台,下课铃响人准时下台,不迟到、不早退、不拖堂,一直都在为教学的高境界动脑子(参见第1节第三点)。当一个人把他一生为稻粱谋的职业当成欣赏对象时,他就拥有了伴随一生的幸福感。可是,把挣钱养家糊口的职业当成欣赏对象,又是多么地不易啊!

4. 余思

有一次,我手拍菩提树干,对自己说道:“菩提,我将把这一生一世聊以自慰的东西与足以自责的东西想清楚,把它看成是我人生最后、最大的责任。这也许是一个无果之望,但为了回报你给我的启示,我

仍然努力地思考下去。”

思考下去。慢慢地,我琢磨出一个连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人生努力新目标——不生气,不生烦恼,持守住一颗宁静的心。

正是在广西民大菩提树下的一年,我同时轮番阅读四本书——*Philosophy of Language A-Z*(《语言哲学词典》,编者 A. Tanesini)、*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牛津哲学词典》,编者 Simon Blackburn)、《李叔同解经》(吴国胜老师借我)以及《禅的智慧》(孟陶宁、郭云成编辑)。第一本被用作课本,教授民大的老师与研究生。对这本书有疑难,便去查第二本(《牛津哲学词典》)。《李叔同解经》与《禅的智慧》则完全用在陶冶心灵。正是这后面两部书,为我在菩提树下的思考画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句号。

学习这两部书,并非抱着成佛成仙的奢望。我只想有一个睡得着的福气。于是,很快就直奔主题:怎样不生烦恼呢?这就要从王安石(1021~1086)的一个断言说起:“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门)中。”为何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门?禅师们有颖悟之智。智慧何处来?离欲即持戒(五戒、十戒),戒能得定,定能生慧。定,又是什么?说到深处,就是没有什么外物能使(修佛参禅之人)魂飞魄散、大喜大狂或者大怒大悲。据史载,确有几个古代高僧圆寂后肉身不腐,在面临死亡之时,谈笑之间泊然而逝,或者自己预定死亡日期,吩咐众僧如何安排后事。这样看来,不生烦恼与问学的关系,是个连环推理:欲不过分得定,定能生慧,慧养学。其中,“定能生慧”的形象的说法是:心一旦宁静,智慧如波浪奔来。

尽可能高的三个素养(人文、自然科学与哲学)+尽可能低的欲望+始终如一的与人为善=宁静的心。获得宁静之心,殊为不易。一旦获得,又反过来促进学者有更高的三个素养,促进事业有所成。我并不觉得获得宁静心与事业成就是不同的两件事。寒山(一高僧)问:“人家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蒙骗我的时候,应该如何对付?”拾得(深得禅机的一僧人)回答说:“只可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好一个“不要理他”!深入想下去,做到极难。敢问能如此自持者,世上能有几人?读到这里,十六罗汉(康熙认定为十六,非十八)看穿世

界、宽容一切的憨态笑态,跃然眼前,他们理性而自信,俨然个个都是哲学家。

如果允许我再次带博士生,我一定建议他们:做博士论文与持守一颗宁静心,一起修成。如果有年轻人再问我,怎么成功地做学问,我一定建议,守住宁静与做学问同时修。何以故?“连环推理:欲望不过分,得定,定能生慧,慧养学。”守住宁静,它需要非常强大的内敛的力量。靠这颗宁静之心,抵抗功利、名利的诱惑,对付谤毁。

同样,我也看不出守住宁静与争取幸福是两回事。而且,守住宁静心还高于问学,高于事业与成功。因为,你可以不那么成功或者仅有小成,但是,你不能不寻求快乐或者愉悦。还有,你无权让自己终生吃苦。

从我决定全面退休的时候(2012年10月)起,每日坚持看新出版的哲学书约两小时(为了 eudemonia),坚持一功(养心放松功)、一拳(太极拳)、品茶、听音乐,将“小动作”(各种穴位按摩)进行到底,任我一叶生命之舟,划到哪里算哪里。最后,仅以一赋,供读者诸君一晒。

菩提赋

常思青牛出函谷,不敢少诵《逍遥游》。予生半道叩语哲,孜孜再续西学路。《谈艺》《管锥》案头师,学之习之遣春秋。冷也清也形而上,拥衾夜读《沉思录》。扪心问,几本书、几篇文,血沥心呕,岂有一字能长久?到头来,顾了内方,失了外周。天下事无尽,人欲偏不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得之声,目遇之色^①,统统归你有,其余勿伸手!菩提树下论菩提,好歹曲直由我走。向前走,不临赤壁讥阿瞞、美周郎,想想下世如何修。

附注

① 化用苏轼“前赤壁赋”句。原文是:“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

(2013/6-12 初稿于南宁;
2013/11/30 修改于白云山下)
(责任编辑 林玉珍)

贺钱冠连先生七十五寿辰

胡壮麟 徐真华 张后尘 王初明 郑延国 梁爽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4)06-0005-09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6.002

博大精深,大家风范

——祝贺冠连先生七十五寿辰

胡壮麟

欣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先生七十五大寿,谨在京致以遥远的问候和祝贺!

冠连先生以他的四本专著:《美学语言学》(1993)、《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2002)、《语言全息论》(2002)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2005),以及百余篇具有理论深度和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界素享盛誉。我个人比冠连先生虚长6岁,但在做学问上差了一截。扪心自问,自愧不如。借此机会,与冠连先生交交心。

冠连先生自1982年开始学术生涯,治学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1986年发表“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后,主攻语用学。就我掌握的不完全材料,自2001年至今的15年中,他发表的有关语用学的研究论文近30篇,几乎每年2篇,其内容有关格莱斯合作原则、新格莱斯理论和维索尔伦的顺应论等尖端理论,也有对冗余信息、面像身势、逆境顺利原则、不合作现象、音感召唤等的具体分析,不一而足。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被我国语言学界美誉为“钱氏语用学”,是北京大学学生2000本必读书目之一(钱冠连2011b),可见其影响之大。2000年,冠连先生以“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一文向学界宣告他的学术转向,至今已发表有关语言哲学文章近20篇,其中以“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为副题的专题系列论文达10余篇,说明了他对该项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系统性。其选题关涉西方语言哲学的三个问题、中西哲学的不同走向、语言哲学的修辞论、证伪法与语言(学)研究,等等。冠连先生的用意很清楚,语言学虽然曾经被誉为领先科学,但它的“领先”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启示和引导。

学海无涯苦作舟。冠连先生在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研究上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进入如此融汇贯通、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于他的知识渊博,功底扎实。这鲜明地反映在他三十多年学术活动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对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美学、修辞学、外语教学与研究、汉语和方言、网络和多模态语

言学、翻译学、对比语言学等学科,都有研究,都有建树。应该承认,我们有时不善于辩证地处理“专”和“博”的关系,往往对“博”有所好者嗤之以鼻,常会简单地扣上做学问“不踏实”、“好高骛远”之类的帽子。现在冠连先生以自己的实践表明,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也就是说,该专的专,该博的博。

那么,人们为什么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专博之人呢?我个人认为,这里存在两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建国初期我国学习苏联高校办学经验,开展院系调整,过分强调了专业化。在外语教学中把所谓的外语专业片面地解释为“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训练。在四项技能中,又不顾国情,把听说凌驾于读写之上,使各个语言技能不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对中小学英语教学、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和专业英语教学的负面影响之深远,至今仍未全部肃清。第二个原因有关我国的治学传统。师道尊严走到极端,学生易为老师的知识所囿,难以超越老师,难以突破;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对个别词语和句型的研究,缺乏对外语语法和语言系统的全面认识。其结果用冠连先生(2001b)的话说,就是“投入多,收效少”。因此,冠连先生对“专”与“博”辩证结合思想和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成功的治学典范。

冠连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还在于他正确的治学理念和方法。首先,他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认为,有些学者对理论所持态度不适当,他们既不了解理论形态的一般特征,又对形而上学持有错误认识。为此,他提出要正确认识理论的价值,理论既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我们将“明白”与“睿智”结合起来,“更好地走上理论的原创之路”(钱冠连2011a)。在这里,冠连先生没有对上述错误认识“跟着转”,也没有停留在空口说白话,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理论研究。不论是语言哲学和语用学,还是其他课题的研究,他从不放过对一个理论的理解、梳理、质疑、讨论和创新的探索过程。例如,为了解决语言理论研究中的原创性,他提出应当重视有理据的范畴化过程(钱冠连2001a)。显然,“钱氏语用学”的问世也得益于他对理论研究的执著和对结合中国情况搞好理论研究的切身体会。

如上所述,冠连先生总是把正在研究的理论与

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一贯反对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的“两张皮”现状。冠连先生指出,对外语学者来说,他们应在回归母语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在不同语言价值观的冲突中才能质疑语言本身,由此探明真相。”(钱冠连 2001b)坦率地说,冠连先生这些话语击中了我的认识误区。我过去一直认为,作为中国的外语专业教师,做好本岗位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就可以了,手不要伸得太长,以至于造成“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局面。在我指导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我总是“告诫”学生当他们用所学理论分析语言时,语料尽量选用英语而不是汉语,不然在学术委员会上难以通过。可见我缺乏冠连先生那样的认识高度和大无畏精神,也缺乏他在障碍前面或是跨越或是绕着走的灵活性。为了解决人们对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冠连先生系统地介绍了启功先生的治学经验:一是敢发疑问,二是大胆设想,三是走自己的路,四是敢负责任,五是再思,六是要有理论勇气。这六条经验组成的启功模式可作为母语为汉语的学者对待国外语言学时所应持有的心态、方式与思路。冠连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介绍一个国外理论后,总是进一步研究这个理论在国内的引进情况和展望。例如,他研究语用学,便写了“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钱冠连 1990),指出我们不单是引进语用学,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就冠连先生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来说,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篇文章是讨论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的。在这些文章中,冠连先生不仅反复强调我们要引进西方语言哲学,而且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之路”(钱冠连 2006)。

一不做,二不休。冠连先生挺身而出,公开批评我国的汉语界。他指出还有比外语界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以及“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问题(钱冠连 1999)。冠连先生在这里批评我国汉语界不重视理论研究,更没有创建学派意识的雄心壮志。为此,他激励我国汉语界学者也应对语言学理论做出贡献,也应创建自己的学派。他还勇于担当起治疗医师的职责,帮外语界、汉语界学者们找出心理障碍的病因(钱冠连 2004, 2007)。对这个问题,冠连先生曾和我交流过,我认为隔行如隔山,少管闲事,何况自己的汉语知识非常浅薄,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其实,我本人内心非常赞同冠连先生的意见,但没有他唯真理是问、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的胸怀。后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召开纪念高名凯先生诞生 100 周年的学术会议,我才大胆回顾高名凯先生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和贡献,提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研究(胡壮

麟 2011)。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冠连先生迈开了第一步,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作为外语教师,冠连先生更注意理论与外语教学的结合,如“西方语言哲学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一文,其用意是说明外语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应当具有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知识(钱冠连 2008a, b)。如果说,八十年代末我国高校大谈“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只是为了帮助外语专业的学生日后多一个找工作的渠道,那么让外语院校的学生学习西方语言哲学才是真正为我们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出谋划策。自改革开放高校恢复招生并开始实行研究生教育,人们长期片面地坚持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只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方向,把翻译拒之门外,其理由是有些学者片面坚持翻译只是一门实践课,没有理论,不能作为学科或专业。直到本世纪初,国内许多高校才陆续设置翻译专业,翻译得以和语言文学并驾齐驱。可见冠连先生(1994, 1997, 2003)所做的工作既证明了设置翻译专业的必要性,帮助人们认识了翻译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又推动了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

冠连先生在学术讨论中的包容精神令人难忘。1989 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潮,我曾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北京日报》的社论和报道,也分析乌尔开希等人的言论,这种自认为“不偏不倚”的立场受到国内外学者两方面的负面反应。从此以后,我不再参加国内外语用学的学术活动。唯独冠连先生能正确评价我在语用学方面曾经做过的工作,不时鼓励。在语言哲学方面,冠连先生肯定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认为“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语言行为中”(钱冠连 2005)。与之对比,我本人 2012 年末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讲学时,却是对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观从五个方面提出质问(胡壮麟 2012)。当时,同样作为嘉宾的冠连先生很淡然地从不同视角解释了我们两人的分歧:一个是哲学视角,一个是语言学视角,缔造了健康的学术氛围。

这就联系到冠连先生有关人品和学品关系的论述。“做学问先要做人”。做学问要具有高尚的人品,具体表现为诚懇淳朴,坚韧坚定,眼光远大,定位正确,容忍宽厚,有独立人格和原则性,淡泊名利,生活质朴,性格开洒自如,等等(钱冠连 1998)。可见冠连先生在学术上的大家风范来自于他在人品方面的自我修养、严以律己。再举一例:冠连先生在 2008 年创建了“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后,在第二届改选时,断然隐退,坚决推举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为会长,以发挥各校的作用,更好地培养学术骨干,这种以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的心态令我钦佩不已。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向冠连先生的博大精深学习! 向冠连先生的大家风范学习!

参考文献

- 胡壮麟. 2011. 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研究——纪念高名凯先生诞生 100 周年[J]. 当代外语研究(3):1-9.
- 胡壮麟. 2012. 人·语言·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6):803-14.
- 钱冠连. 1990. 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J]. 现代外语(2):23-28.
- 钱冠连. 1993. 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M]. 深圳:海天出版社.
- 钱冠连. 1994. 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J]. 中国翻译(4):14-15/34.
- 钱冠连. 1997. 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J]. 现代外语(1):32-37.
- 钱冠连. 1997/2002.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钱冠连. 1998. 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1,46.
- 钱冠连. 1999. 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历史任务[J]. 外语研究(3):5-10.
- 钱冠连. 2001a. 有依据的范畴化过程——语言理论研究中的原创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10):1-4.
- 钱冠连. 2001b. 外语研究四难与学者个人素质[J]. 福建外语(3):1-3.
- 钱冠连. 2002. 语言全息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冠连. 2003. 语言哲学翻译论——简评工具性语言扩展式[J]. 中国翻译(5):31-35.
- 钱冠连. 2004. 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J]. 汉语学报(2):2-8.
- 钱冠连. 2005.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冠连. 2006. 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之路[J]. 中国外语(1):5-6.
- 钱冠连. 2007. 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学派问题上的心理障碍[J]. 中国外语(1):28-30.
- 钱冠连. 2008a. 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钱冠连. 2008b.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 外语研究(2):1-16.
- 钱冠连. 2011a. “跟着转”:输在理论贫乏上——从理论形态的一般特征到创造[R].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九次会议论文.
- 钱冠连. 2011b. 思在昆仑山下——眼光与定力[J]. 当代外语研究(10):1-4.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阅读钱冠连

——我为何挽留钱先生延教十年

徐真华

我与钱冠连教授相识已逾廿载,但真正认识钱先生是从这十年开始的,当然也是从他的著述而起。

记得那还是在本世纪初,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与语言哲学有关,颇觉深奥。会上认识了北大、人大几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闲聊起来居然聊到了广外的钱冠连。他们赞叹道:一个搞语用学的英语教授,能把语言哲学研究得这么深透,说

得这么明白,确实不简单。会议结束时,我向胡壮麟先生道别,先生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广外校长,爱才、惜才、用才当是头等大事。

回穗后,我搜集钱先生的论文、著作,细心拜读。了解到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哲学的系列论文(以及后来的几本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为广外及应邀为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西方语言哲学”课更是盛况空前。先生坐而论道,起而践行,学问人品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好评。他对非母语理论创新的执着,对“言说他人所未说”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使他成为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他常常扪心自问:“在宇宙中,你的地位在哪里?”他说道:“欲望是这么一回事:社会地位往高处要,声名往显赫里找,物质享受往最好处捞。欲望不达,大小悲剧迭起。非份之想越大,悲剧越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人,一辈子不是狂躁肿大、贪婪虚浮,就是飘飘荡荡、魂不附体。知道自己在茫茫宇宙之中的位置,情形会好得多。那么,让我们抬头看看天空苍穹怎么样?哪里是我的位置?答案是:我什么也不是,连尘埃都算不上,什么都比不了,本来什么都不是我的,既然如此,怎么还敢要求那么多?”^①于是,他移情于阅读与创作,沉浸在书籍与思辨的世界,心无旁骛地投入唯此为大的语言家园。他信“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因此,他对学人、同事也多了一份尊重与宽容。钱先生对教育事业始终充满着责任感与使命感。为了感谢生活慷慨的馈赠,他总是努力地思想,努力地钻研,偶尔发出不如意的叹息也改变不了他的执着前行。

多年后,钱先生向我提起一段往事,说是我的一个电话延长了他十多年的学术生命。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徐真华是他人生关键时段(60~71岁)的提携者、助推者,对他晚年的创作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原来,在钱先生60岁那年,广外人事处上报已达退休年龄的教职工名单,让我过目,我随即给人事处长挂去电话,说:“钱冠连这样的学者,广外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这些学术造诣深的教授应为他们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不能一退了之。”钱先生就这样留下来了。我当时并没有太多更深更远的考虑,但是直觉告诉我,一所伟大的大学不能没有伟大的学者。广外还远称不上伟大,但是对那些享誉全国的著名教授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倍加珍惜。

光阴荏苒,未曾想,我也已年届花甲。其实钱先生之所以延教十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的电话,而是这个电话背后钱先生的学问人品。

1. 他是外语界公认的为数不多的从事原创性工作的学者。他的著作几乎无一重复前人。延聘之后,《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获奖。《美学语言学》则让出版社获奖。

2. 他努力攀登,坚毅、忍耐、实干、低调。他鄙视“媚俗”,崇尚恬淡。他性致远、守宁静,决无踏浪高歌的狂狷,只是静静享受读书与写作的快乐。

3. 他释道有方,笔耕舌耕深奥的语言学问,把复杂的理论问题搞得简明又有趣,每每博得学生的击节应和。

4. 他纯粹地做学问,不为时风动,不受名利累。这让我想起了莫言的那句名言:“文学可以影响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作品告诉读者: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②钱先生的境界与莫言推崇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众人都笑时,应该允许有人不笑。

5. 他勤于学习,善于思想,长于发现问题。他有个性,但不顽固;有热情,但不张狂;有才气,但不孤傲,且年纪越大越是反思自己的不足。

6. 他不断地推陈出新,把语言哲学推向全国。由于他的推动与影响,国内不少著名高校纷纷成立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所,开坛“讲经”。他影响了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钱冠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放下了常人难以放下的私欲,于是,就放下了一切。“没了负担,没了阻碍,反而自由了……”^③他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收获着常人难以品味到的快乐与宁静:教学楼上方那最后一抹晚霞,相思河中戏水的锦鲤,枝头鸣唱的鸟儿,乃至一个稚嫩的问题,一个会意的微笑都让他感悟到心灵的喜悦与慰藉。

钱老师,保重!感谢你为教育阐释的平凡与不朽,感谢你为生活创造的意义,感谢你智者的胸怀。

参考文献

- ① 参见钱冠连:《试答人的宇宙地位之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11月3日第4版)。亦可见《眼光与定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之自序。
- ② 参见《读者》2010年第10期第63页。
- ③ 同①。

(徐真华,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文学院名誉院长、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常委。2000~2010年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冠连兄人格赞

张后尘

1. 赞钱冠连先生的人格、人品、气节、豪气,美哉!钱先生的美德,由小生成(参见《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75年生活中,成熟起来,令学人仰慕。

2. 每次同他接触,都感觉学者精神徐徐有力地流进自己的血里,生成力量和信心,使目标更坚定。

3. 钱先生在人格气节上有两处恒久不变,也很难因人左右。正确的,他不变;错误的,尽快变。我最先接触他时便觉有一股清新感,至今仍不失活力。

4. 钱先生有两个气节伴之相随,使他人气鼎盛。一是人品向学品迁移,可向正也可向负。这为我们提供了人格(人品)的动态研究依据,而不会把动态研究搞死。二是钱先生坚韧不拔的锐气和深刻的思想。从钱先生《葡萄》一书的许多片段可见,且始终如一。他处处以治学精神支持青年深造下去。他问过我:“500年后谁还记得谁?”我知道他的用意是鼓励我为社会多做贡献,但又不执着于声名。

5. 《葡萄》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这是由血和汗凝集起来的堡垒,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篇篇各有特色,大体上却连成一体。这些话题连起来,似金玉珠连。细细玩味后,会大有所获。诸如“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为自己设计一盏照明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争取一个圆圆的记号”、“五百年后谁还记得谁”、“巧合之处原是办学之本”……这些明珠指明了为学、为人之道。小文亦是大文章,端看读者如何去品!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大文章!

6. 钱先生热爱自己的专业、事业,已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曾经打算退休后,还干一干。有许多老师朋友得知后闻风而动,希望调他高就,以助他大展宏图。我知道情况后,力荐他到大连外语学院从教,继续语言研究,并出任《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他坚持不“夺”我的主编。我认真地同他交谈、对话,他仍坚持不做主编,只做一般责任编辑,只当助手。后来他们学校不让他退休,我们作罢。事虽未办成,我们的友情越发深厚,越有共同语言!20多年来他为《中国外语》和《大外学报》做了大量工作,使《中国外语》作者共举一个目标,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团结了一大批业界人士,在国内外、香港、台湾成为国家核心刊物,影响越来越大。

7. 钱先生不仅在本校致力于发展西方语言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还转战南北。冠连兄人品、学品造就了一批德才浑厚的优秀学者;冠连兄的人格永远滋养着后来人!

(张后尘,高等教育出版社国际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外语》杂志社名誉主编、词典学专家、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顾问。)

钱冠连的治学境界

王初明

钱冠连教授和我在同一研究中心工作,共事整十年。在这十年间,他治学的境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常使我反思如何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反

思缘何当今博士虽多却少有学术大成者。

1999年末,学校让我牵头筹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了提升语言学研究在国内同行中的竞争力,原有的语言研究所需要重组,科研队伍需要整合。此时正值钱老师法定退休年龄,按常规,他将享受退休生活。然而,组建重点研究基地最迫切需要高端科研人才主持重大课题,并产出“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而这样的人才在外语教师中并不多见。钱老师多年潜心钻研,喜欢“舞文弄墨”,思维十分活跃,发表了不少论著,到研究中心来工作最合适不过,学校欣然将他圈入专职研究员名单。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并不特别惹眼的决定,却给我们研究中心带来了一个惊喜,也为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一个拐点,助他将个人的研究兴趣与事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接下来的十年铺就了一条上升的学术通道。他需要事业发展的平台,重点研究基地需要学者完成国家课题。当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人的潜力便能得到极大的释放。

在重点研究基地里,钱老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拓荒种地,默默耕耘,铆足了劲做研究,有一年竟发表论文逾10篇。几年下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还培养了一批博士生,活跃在高校学术圈里,延续了他的学术生命。

记不起是哪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你若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那就开一门新课或写一本专著。这话在钱老师身上应验了。在我国的学术圈里,钱老师因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而扬名。在我看来,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缘于为博士生们开设的西方语言哲学课。他原本便对思辨性的学问极有兴趣,接下开课的教学任务后,就更加如鱼得水,酣畅地享受着研究的乐趣。他大量阅读,思考质疑,撰写讲义,整理心得,硬是凭借终生练就的那股自学韧劲,把这门学问做得有声有色,专著一部接一部地出版,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将西语哲学打造成了我们研究中心里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方向。他的成果对我国当今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外语学刊》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担任我国西语哲学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为推动我国此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引领性贡献。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学校按规定让他退休,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人才不是被埋没了么?还会有我们的西语哲研究方向么?真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啊!

钱老师之所以有此成就,是跟他做学问的思想境界分不开的。他视原创性为做学问第一原则,并努力付诸实施。在我国的外国语言学界,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常见学者们借助外语优势,大量发表以介绍性内容为主的学术文章,于是逐渐习惯于“拿来

主义”。好一些的,其成果还会往前走一步,在引进的同时能够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国外的理论应用到我国的相关领域,解决国内问题。这样的局面一直在持续着,尽管这不是什么坏事,甚至还有必要,但毕竟也有不足,那就是对构建新理论贡献不大,创新多由外国学者去完成,我们拾人牙慧。无自己的创新成果,拿什么去与国际同行对话呢?偏重引进介绍的局面终究是要打破的,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钱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并为研究原创性的必要性鼓而呼,且尽力践行。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专著,总不忘创新。对我国从事外国语言学的学者来说,增强创新意识可谓思想认识的解放。时至今日,追求学术创新的风气已在我们研究中心形成,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验证了钱老师较早提及的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只有创新,科研才有光明的前途,水平才有质的飞跃。

记得在2004年,为了宣传科研要创新的观点,他发起一次公开的学术“脱口秀”,邀我参加,就语言学研究如何创新发表看法,会场坐满了研究生和一些教师。讨论由他主持和点拨,引发思考。在对话过程中,我提到做科研要以我为主的重要性,认为“以我为主”是创新的源头,其对立面是“以他为主”,典型表现是引进和介绍,跟在别人后面跑,赶超十分困难。而要做到“以我为主”,以研究问题为导向是必须的,围绕自己的研究问题读书、思考、观察、求解,归纳和演绎方法并用,特别是要善于通过演绎方式,大胆提出假设,再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毕竟,实证是有限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知识生产的本质就是创新。钱老师为创新而强烈呼吁,实则是抓住了科研的本质。当然,产品流通也有其价值和必要,但人类却不能只停留在知识的流通和传授上,知识必须先有创造,而后才有流通,惟有创新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有人认为,前人生产的知识足以用于流通,使得教师们不需要生产知识也能生存。殊不知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其首要任务应是培养能够生产知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才,不能创新便丧失了学校存在的价值。身为大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专职研究员,钱老师之所以受到同行们的关注,就在于他做学问永不忘生产知识,也生产了新知识。他致力于想别人未想过的事,说别人未说过的话,写别人未写过的文。他撰写的四本大部头专著,每一本书都修改过数十次,无一重复前人,努力做一位生产知识的先进工作者,足见其创新意识的强烈。

在我们研究中心,钱老师是未读过博士而当上博导并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学者。他真正步入做学问轨道的黄金时段是文革之后,但他对学问始终不离不弃,一有机会,潜力和才能便迸发出来。学术前辈王宗炎先生在评价李筱菊教授时曾称她“是桃树

就得开花”。我想,这样的评语同样适用于钱老师。他身上突显的特质说明了他的学术成就并非偶然:生活有目标,事业心重,使命感强,执着追求,矢志不渝,踏实认真,锲而不舍,不断攀登,永不满足。这些个人的内在特征铸就了他治学的精神境界。当今博士生众多,做研究的外部条件远比钱老师年轻时期的优越,而超出其成就者却不多见,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思想认识尚未达到钱老做学问的那种境界。

(王初明,国务院学术评定委员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冬收斋中别有情怀

——我心目中的钱冠连

郑廷国

钱冠连是当今外语学术界的著名语言学家,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殊不料作为一名一直在语言学门外的踌躇彷徨者,从1994年算起,我居然和他交往了整整二十年。这种交往基本上与语言学本身没有太多瓜葛,由是我所见到的多为这位语言学家的另一面。

1.

1999年12月,我专程到广外去拜访钱冠连。他领我到云台花园走了一回,谈笑间,分明显露出对树木花草、蓝天白云的爱好。难怪他千里迢迢地从鄂西来到了珠江三角洲的白云山下。除了是对学术环境的选择之外,不能不说也是对岭南风光的一种特殊钟情。

依依话别时,他说他正在酝酿一篇外语学人对母语进行研究的文章,希望我能搜集点资料供他参考。返湘之后,不知百度谷歌为何物的我,只好将自己变作一条虫,在图书馆的纸堆里爬了好一阵,然后将爬行所得复印给他。翌年7月,他果真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厦门年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他特地加了一条注释,称我“贡献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表示衷心的感谢”云云。我知情后,分外感动。不因人微而掩其劳,不因事小而隐其实。冠连兄的人品由此可窥一斑。

2.

在彼此的书信往来中,他对我写的毛笔字很感兴趣,甚至称我的“书法甚佳,信件可作墨宝欣赏,这也是人生一荣也”。

2001年4月,他的大作《语言全息论》已经完成了第三次修改,即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

嘱我用毛笔题写书名。我自小便喜欢写毛笔字,且自以为略有几分基础和稍具些许个性,但真正要派上题写书名这样的用场,心中不免少了许多底气。他立马鼓励说,你就像平常用毛笔写信那样写就行,不必拘谨。盛情难却,只好放开胆子涂鸦。这年10月,他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了解是书的发排进度,然后兴冲冲地告诉我,封面设计得挺出色,题写的书名由横排改成竖排,格外耀眼。2005年4月,他的又一部大作《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同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书名同样由我用毛笔题写。由于他的一再信任,这次毛笔字的书写,比上回好像有了点进步。

每逢自己在图书馆当爬虫时,只要一瞥见书架上立着的这两部书,就仿佛看到两朵硕大的牡丹花在吐红怒放,封面上的毛笔字则像两朵小小的苔花在偷偷地乐着呢。

我知道,冠连兄之所以如此看重毛笔字题写书名,实际上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扬和敬重。正是这种理念的支配,他才有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行世,让季羡林赞不绝口;他才有“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的发问,这掷地有声的一问,无疑和“钱学森之问”具有同等的价值。

3.

2006年底,他的散文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之前他邀我为书作序,我将这部25万字的书稿反复细读之后,在序中这样评论道:书中的文章,都含有深深的寓意,是作者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现象的哲学思辨,包括对人生的参透、对名利的剖析、对人格的品评、对生命的感悟、对社会的建言、对学术的追求、对生态的关注、对往事的沉思、对师友的缅怀、对故乡的眷恋,等等。这些时而充满理性、时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无不展示出作者思维的敏捷、眼光的深邃、言语的犀利和行文的奇特。

这部散文集毋庸置疑地折射出作者的才华是多方位的,既能从事刚性的科研写作,又能纵横柔性的散文写作,犹如手持一把能够左右开弓的双刃剑,处处得心应手。我尝感叹:如果他专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是一位硕果累累的优秀作家;如果他专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研究,则很有可能问鼎两院院士。理由是他勤于学习,敏于置疑,敢于思考,善于创新,勇于实践,更可贵的是他有一种要为人类作出点奉献的胆识。

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也十分佩服钱冠连的人品和学品。他非常欣赏书中的话:“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也不说葡萄是酸的。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并欣然赞曰:“也许正是这种平常人的心怀为我们塑

造了一个寓不平常于平常之中的钱冠连!”

4.

2009年1月,《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系“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之一。煌煌巨制,厚达675页,由七个部分组成。他所带的六名博士弟子参与编选。书中《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发展》一文令我生发出这样一种认知,即为了让更多的外语学人了解和研究西方语言哲学,以达到“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之路来”的效应,有必要将书的第二部分,即语言哲学部分,从这部沉甸甸的巨制中剥离出来,冠以《语言哲学十五论》的书名,成一单行本。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起众多外语同行的广泛关注,从而使语言哲学研究渐趋普及。

我曾三度写信给他,谈了如许想法。他在复函中称我的建议十分有益,且云:“为编辑拙著《语言哲学论》,你三次书信详细建议,多次电话问及,这种事在学术界少见。为朋友出书,墨催远问,诫督恳促之状,只有我这个当世的朋友才能感知,外人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为了突出中国语言哲学的新思维、新面孔,以避翻炒西方语言哲学之嫌,他后来提出了一个新的书名及新的构书框架。书名为《后语言哲学之路》,全书由“后语哲汉语语境化三例”等六个单元构成。这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如今书稿完成,付梓在即。他那种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说到他的虚怀若谷,我犹记起了他的另一件往事。2000年,他已六十有一,按照常规,很有可能“老而退闲”。孰料,他却被聘为刚刚成立的广外文科基地的专职教授,而且在博导资格的盲审中获得高分通过。意料不到的变化令他想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晚成斋”。我知道后,立马用宣纸以毛笔写出这个斋名赠他。想不到他回复说,不能用这个斋名了,理由是“‘晚成’与‘大器’总是互相提示的”,倘若将这个斋名张扬出去,“岂不是以‘‘大器’自诩?你写的三个大字看来只能当做书法作品珍藏了。”随后,他将书房易名为“冬收斋”。显而易见,这个书斋名的深层含义是:春种秋收是常规,春种冬收是超常规。超常规说明斋主的听夕耕耘比别人要辛苦得多,要艰难得多。区区两个字的易动恰恰是冠连兄人品的又一次闪亮。

5.

毋庸讳言,我读他的学术专著,往往是以“任凭弱水三千,我仅取一瓢饮”的方式对待,因为我的所谓科研领域实在是太狭窄了。他那些有关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深刻思考,我多是望尘莫及,难以契

入,但对他的治学方法研究以及翻译理念阐发倒是情有独钟,一拍即合。我读他的《翻译的语用观》,简直到了“韦编三绝”的程度,并由是撰出一文,为《上海翻译》刊用。我甚至冒着夏日炎炎的酷暑,怀着格外虔诚的心态,将他的五部学术专著《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语言学自选集》一一通读,把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一字字、一行行地抄录下来,然后写出了《钱冠连的翻译理念》一文,收入自己眼下正在撰写的《潇湘子译话》一书中。

以治学方法而论,钱冠连的《研究型读书法》、《人生三宝与我的求学、教学与治学》二文便是最为醒目的实例。他在文中表述的“读别人的书,写出有自己思想的书”、“没经典式的主读,就永远别想进专业之门;没辅读,就没有了合理的知识结构,也就没有新的发现”和“把一个领域里的一些必读书,搞精、搞透、搞细,边读边在书眉书边批注自己的灵感。这样,一本书读完,自己的思想也就诞生了。此后,立即说出自己的话(写作)”等理念,常常使我耳目一新,仿佛自己在山重水复中绕来绕去时,突然看到了柳暗花明的迤逦风光一般。我曾在拙文《不动笔墨不看书》中,特地张扬了他的“眉批写作法”,称“语言学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常以此法读书,再兼以其他方面的努力,由是成为外语界的名流,深为学人仰慕”。

治学方法研究、翻译理念阐发无非都是他科研中的“副业”或曰辅业,然而产生的成果却格外耀人夺目。

6.

尊重他人劳动,敬重文化传统,写作刚柔并举,乐于接受异见,治学主辅结合,凡此种种,便是我二十年来所见到的钱冠连的另一面。当我行将写毕此文时,我攀上了毗邻的南岳山脉第七十二峰岳麓山,站在山巅,我纵目南眺,仿佛看到了白云山下的冬收斋中,那位年逾从心的语言学家正迎着灿烂的朝阳,在默默耕耘,宛如其于十二年前在《语言全息论》后记中所说“一觉醒来,又该出发”那样。

(郑延国,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攻翻译理论。)

为师的细节与GO构式的解读

梁 爽

从师十余年,老师对我们为人为学的影响,老师于我们亦师亦父的感情,浸润在无数细节中——导读、聚餐、爬山、散步、远足、论文和邮件。梳理这些细节,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却应和了老师近年来最

心仪的维特根斯坦式写作风格。有些细节,如英语单词 come 和 go 那样平常,串起来就有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那样的纪实感。

说起英语单词 go,它在英国国家语料库(BNC)高频动词里排名第9,具有多种构式解读,比如(1)表示方位移动(Movement),如 *I'm going to school*; (2)表示归属(Belong),如 *That piece goes there*; (3)表示消失(Disappear),如 *Where was the book gone*; (4)表示意愿(Intent),如 *I'm going to watch a game*。假如我们绕到老师一行行铅字的背面,再以 go 的四种构式解读为索引,可以查阅到他近十余年学术生活轨迹的四个片段:(1)老师在行走中酝酿思想的习惯;(2)退休前后的归属定位;(3)摒弃对成功的误解;(4)“跳一跳、摘葡萄”的意愿。这四个细节勾勒了老师在语言中穿行、反思和栖居的图景。

1. 移动的思想

老师的书房称为“冬收斋”,那是他的学术产房。但孕育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这些思想的,远不止书房里满墙的书,还有墙外老师揣着思想种子的行走。不管是思考语用学问题,还是更抽象的语言哲学问题,老师都不会把自己宅在 CNKI, Elsevier 或 ProQuest 数据库的文献里。他习惯长久地关注一个问题,把问题“宅”在心里。在灯下啄别人的书,磨自己的文章,揣着自己的问题,迈出家门,让思想在移动中发酵。他每日捡校园小径踱步,引颈盼白云山松风拂面,或打量千层沧桑的树皮,或低眉端看木棉花瓣沿相思河漂漾。他独行的步态似乎五味杂陈,少了老人们纯养生的闲适,多了叩问语言的踟蹰:语言如何使思想落定?有没有不需要语言的思考?由 Tarski 真值语义理论引申出工具性语言有何意义?

在外讲学,老师也不丢散步思考的习惯。他在广西民族大学的校园里,偶遇两棵菩提树,于是手拍菩提树干,冥想与树一问一答的沉默对话,回顾今生问学之路。引述老师自己的说法,“所谓有闲工夫在校园内走动,不就是有时间思考吗?”go 构式的第一个解读——表示方位移动——正好指向老师在行走中酝酿思想的习惯。

我们在广外的那几年,常随老师拾步,一路上都不敢任思绪旁溢,因为他随时可能抛出一截评论、开封一个问题。瞥见人家院子里晒太阳的狗,他会冒出一句,“狗子争骨头,是不依靠符号中介的”。聊起出差趣事,“我们早饭 18 块钱吃了 5 个人”,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他随即追问,“你们说,该怎么解读这样的句法,‘多少钱吃了多少人?’”

在经年冷寂的学术生活中,老师这种随身携带问题的散步习惯,好似小火煨一罐罐心灵鸡汤,使其

写作饱有热度和鲜味。对他而言,不写则已,写则必投入情感与心血。

2. 退休前后的归属与指称

王初明教授曾诙谐地把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比作一根藤上的两根苦瓜;博士生越多,导师越苦。我们每每面称“老师”,都是对苦瓜藤上共生关系的诉求。我们给老师带来了各种苦恼和负担,他却兑换成苦中作乐,咀嚼着“老师”这个指称带来的归属感。他不介意随我们挤在大排档里,就着一碗小米粥、一笼蒸饺、一碟生菜,跟我们聊东说西。他惦记着节假日邀我们赏花、踏青、听音乐会。周末导读结束后,他领我们去云山咖啡厅,伴着音乐品读杨绛的《我们仨》,并分享“偷运”进咖啡厅的烤红薯和鸡蛋饼。绑定多年的苦瓜师生慢慢结成了家人般的纽带,这是 go 构式归属解读在这个阶段的体现。

我们毕业离校后,“老师”变成了隔着邮件和电话的称呼。他会有些许空巢的失落吗?我们多虑了。2007 年 9 月,老师发来邮件,主题是“我认真地清闲起来了”。难道清闲还需有板有眼?我们一开电视、一端茶杯、一蹬运动鞋不就能清闲起来吗?但转念一想,在钱氏词典里,“清闲”恐怕一直是个低频词吧。他既无心清闲,也无暇清闲。初到广外,他一边为生计稳定而打拼,一边铆足了劲笔耕不辍。升为博导后,他又被我们的毕业论文“绑架”,常常夜不能寐。直到 2007 年,老师升级当了爷爷,获得了朝思暮想的新指称,归属重心才自然转移,“博导”变成了“爷爷”的修饰语。这位博导爷爷,甘听孙女的使唤,甘愿跑龙套,还乐此不疲。老师终于得闲了,衣食无忧且身心自由。

当他认真地清闲起来,常追忆“老师”这个指称里裹挟的往事。2009 年 3 月,他在题为“师与生”的邮件中,表扬我们当年“在老师病中代其子女照看,病后又成了健康‘督察’,同时,为老师整理文稿,编辑与点评老师的自选集”。这样的师生关系,老师谓之曰分忧与传承;这样清闲的忆旧,老师谓之曰随笔随想随风吹。他还特意交代,此类随风吹的东西,不必回信浪费时间。看得出,他把我们的师生情义时时保鲜,但又有意淡化自己为师的角色,似乎想挪到 go 构式的归属维度上师生关系比较松散的那端。毕竟,在退休阶段,老师选择的出场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躲在帘后听鸟鸣”。

这种躲法,在其所著的《人自称、人被称与物被称》一文中表现得颇为特殊。该文含有几处非常规的夹注标识,如“这一思想得益于王爱华”、“这一思想得益于梁爽”。他把师生邮件往来谈及的非正式想法、把无需点明出处的互文郑重地“曝光”在正文中,而自己躲在出处后面。可见老师对学术思想的

归属极其较真,再细微的思想也乐于点明出处,就好像把 go 构式的归属去向在一个语境里指称的明白无误。老师人品学品使然——淡薄名利,淳朴做人。

3. 摒弃对成功的误解

急性子是老师平和心态的大碍。早在 2003 年,他就跟师兄们“坦白”过,他这人性子急,有什么事不马上做,就坐不住,心怦怦直跳。于是师兄在我进校之时面授机宜,说话做事不要啰嗦、不得拖沓。我们最担心寝室的红色座机在清晨骤响,那也许是老师临时吹响的集结号。灌口凉水、抹把脸、捋下头发、套件衣服、抓起纸笔,赶紧出门吧。因为老师在搁下电话后,八成已在客厅团团转了,他会盯着墙上的钟,虚掩起大门开始倒计时。

因为急性子,老师吃了不少苦头。他有六、七年时间睡不着午觉,且常常夜不成眠;62 岁被确诊心脏缺血;66 岁时身体健康透支导致颈椎病爆发。大病一场,老师却因祸得福,开了窍,悟出“快乐第一,成功第二”的快乐哲学,设定了一个连他自己也没料到的人生新目标——不生气。从 go 构式表示“消失”的维度看,他对成功的误解自此消失,他的急性子也在慢慢淡去,开始自觉养生,不忙、不赶,愿健康自得。他每天散步、练养心放松功、打太极、面壁蹲、按摩穴位,还跟好胃口作斗争。他以治学的热情和智慧养生,常对自己望闻问切,并因循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中医八纲辨证进行因果判断,俨然“钱医生”。他医治自己的身体病痛,也正视自己的负面性情。可谓越到老,越洒脱,越自省。

4. “跳一跳、摘葡萄”的意愿

洒脱和清闲并不意味着学术上要停摆。正相反,老师在颐养天年之时仍揽“跳一跳、摘葡萄”之愿。换言之,就是愿意不断地超越自己,但不拼命,不跟自己较劲,不垫起脚来充高个儿。如果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就走开。老师的葡萄哲学与快乐哲学应和,着眼“慢和简”的生活。慢慢地啃书,啃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慢读书,可以慢到什么程度? 蒯因的《词与物》——英文原著和中译本,足足读了 2 年,绝无旁及。为何读得如此慢? 因为精读,如磋如磨如雕如刻。啃进艰深的西方哲学,而后简陈自己的思想,如《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等,好比摘取了一串串爽口的葡萄。

“不停不缀,就是快”,斯言妙哉!

读书求慢,生活求简,摘葡萄时方能跳得高些。老师的生活喜做减法,一个红薯或两个土豆当一顿饭;一片青草、一汪湖水,亦成愉悦之源。他七十大寿时,婉拒学生礼物,道其理由:“生日最需要的是快乐,我已有了。我真正缺乏、真正想要而别人又无法赠送的东西是:宁静”。

老师在宁静中摘葡萄的心态,大异于 50 岁时从语用学跨入语言哲学的心态,一种他自嘲为末路出家去拼闯的心态。心态或静或急,其创新信条恒然。自 2001 年在广外开讲语言哲学后,他酝酿出无中生有的意愿——在中国外语界开辟语言哲学之路。为摸索这条创新路子,我们师徒在 2004 年夏天游学滇西。老师对中国后语言哲学之路的构想在海品茗、泸沽湖泛舟、十八弯盘行时徐徐展开,在过桥米线、炒饵块、锅巴洋芋的余香中慢慢吐露。当我们落脚在泸沽湖边的卓玛家,每日诵读《古文观止》,并畅想夏日书院的模样。课后,我们光顾临湖的小饭馆,独享铺着蜡染布的木桌,安静地读写。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而内心淡然的我们,正与老师于游学中体现 go 构式的意愿解读——探求创新的摘葡萄之旅。

十年滑过,老师与外语界和语言哲学界的同仁们携手蹦跳,采摘到一串串葡萄: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八届夏日书院及四届国际研讨会、《外语学刊》专栏及会刊《语言哲学研究》、《西方语言哲学经典原著系列》等等。其中,老师主持的夏日书院首创公益模式,提倡学会内部的讲课人尽义务,承办学校讲奉献,学会则以荣誉证书和锦旗相赠。此举为研究会铺垫了健康的氛围,是被誉为“学术传承”的善举。

“离欲得定,定能生慧,以慧养学”,这是老师在生活中历练、在反思中萃取、用语言定格智慧。

这十余年跟我们相处的老师,是一组在不同场景的生活照,是一串不断更新的叙事;而非百度上、公众视野里的一张证件照、一张简历表。以上几段近距离的特写,呈现的是老师立身立言背后的有声故事。如今,老师不与时间赛跑,而携时间同行,以爱智之人的纯粹,施展自由泳式的思考和浓缩型的写作;他不再苦苦计划生活,而放手拥抱等待他的生活——如 Joseph Campbell 忠告的那样,一切顺势,积极而为。

(梁爽,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论钱冠连学术思想的脉络及其价值

王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715)

摘要:钱冠连先生一生真正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且还“创新到老”。他呕心沥血写下的四本专著和近百篇论文,摘得了人生奋斗中一串串多而沉的学术葡萄,在国内外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著中所提出的若干观点独树一帜,从人的生存状态和哲学角度深刻揭示了语言乃至世界的规律,既有经验性分析,也有思辨性探索,更有不断创新的火花。他立足理论建构,见解精辟,自成一派,在学术界发挥着领军作用,大有拓荒者之风貌,值得国人仿效。

关键词:钱冠连,中国后语哲,创新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4)06-0014-06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6.003

1. 创新时代,从无到有

“与时俱进”作为一句流行习语,其义十分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坚守了“与时俱进”的正确方针,使得各条战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学术界亦如此。回顾这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语言学界,正是沿着一条康庄大道走进了新世纪,从结构主义、转换生成、系统功能、认知学派,一直到语言哲学,一批学者发奋图强,“寂寞书斋不寂人^①,板凳虽冷暖人心”,不断引进和吸收最新观点,可谓迎头赶上了落后于西方数十年的语言学研究,钱冠连先生正是这批精英中之一员,近三十多年来刊发了一大批创新性专著和论文,践行着“继承兼发展”、“节外生新枝”的问学之道,在我国语言学界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擅长形式逻辑,从而建立了一整套以公式化形式为基础的学科,包括经典形式逻辑、数理化等学科。而我国古人却行进在一条与西方传统不同的路径上,注重人文方法,擅长辩证逻辑,如道家早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关于“有无相生”辩证逻辑的命题,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一切矛盾都处于相生相克、相互依存、对立转化的过程之中。没有“无”,就会缺“有”;存在“有”,亦可变为“无”,或生出另一种“有”,即“新有”,可将其归结为“无中生有,有中生新”,钱冠连先生也正是循此道而前进的。在他的研究中,不乏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闪亮成果,为我国学界所赞颂。

2. 专著之创新与生有

钱先生凭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沉淀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同时还坚守着与时俱进、无中生有或节外生新枝的精神,科研成果自然就是丰硕的,而且还沉甸甸的!

仅就专著来说,他出一本,是一本,既有“数”,更有“质”,可谓本本见彩,册册出新,无不彰显着“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创新范式,堪称我国外语界的“理论拓荒者”。他的每本专著都有自己的新理论、新范畴、新命题,为我国语言学界不断输送新养分。若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来说,他“再范畴化”了若干新生枝叶,或曰,“再范畴化成就了他的原创理论”。钱先生所写四本专著可简析如下。

(1) 美学语言学。他于1988年至1992年期间就在思考将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诠释语言美和言语美这一全新命题,尝试建构“美学语言学”这一新兴的语言学边缘学科。功夫不负有心人,成果终报拓荒者,他于1993年正式出版了《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第一版),后又于2004年出第二版,从理论上论述语言美(或不美)的规律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紧密联系社会意识和民族观念,系统阐释语言美和言语美的各种现象,详实地阐述了各种审美选择、言语求美律等。本书可谓融贯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艺术等门类的知识,首倡“美学语言学”这门新学科,实属“无中生有”之作,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羊城晚报》、《书摘》、《服务导报》上均有转摘和评论;广东电视台岭南台、珠江台也分别给予了报道;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哲学兼语言学家教授 Hermann Perret,以及国际语用学会中心教授 Yan Nyuts 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足以显示钱氏理论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第二任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电子邮箱:angloamerican@163.com

钱先生(2004a:2)书中一句话可用来概述该学科的主旨,“既要研究人们创造和欣赏言语美的特点和规律,还要研究言语的丑,但这归根结底是为了研究在一定条件下变丑为美的特点和规律。”

(2) 汉语文化语用学。当学人们还沉浸在钱氏美学语言学带来的喜悦和兴奋之中时,钱先生又迈开了思维的步伐,大踏步地进军于另一领域——汉语文化语用学。他于1997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文化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第一版),于2002年出第二版,基于母语语料的分析提出了“三带一理论”,真知灼见地将语用学定位为:人文网络言语学。具体来说,它涉及了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因素,尝试用“附着于人的符号集合”(除话语行为之外还包括:语声气息、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来解释具体语境中的语言运用现象,并以此来批判索氏和乔氏的纯语言或纯句法研究之不足,从而证明了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学科,因语言各层面的研究最终都要落脚于运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非常有用的、生气勃勃的、生命力旺盛的学科。

人文网络言语学遵循“有中生新”或“节外生新枝”的问学之道,是根据现有语用学理论、中国文化特点和汉语语料建构的属于汉民族文化自己的语用学。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三带一理论”适用于阐释话语的运用和理解,其理论深度不亚于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论,为我国在国际语用学研究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季羨林先生赞其有“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见该书序),为何北大、南开均将其列入本科生必读书目,为何浙大(和其他大学)将其列入博士生必读书目,为何该书的汉语界读者比外语界读者更多,为何汉语学者直接从该书派生出一些新书,为何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都流传着该书!这本书的得奖,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下一句话可以形象地反映出该学科的核心思想,“只要你一说话,这个人文网络就跑出来纠缠你,它也要‘说话’,并且还真能操纵你!”

(3) 语言全息论。读了上面两本专著,名副其实的专著,在其中所建构的钱氏语言理论中,有些问题已得到了初步澄清,或较好的澄清,但有些问题还未能加以详述,如他在《美学语言学》中曾提出的一个观点“语言结构与宇宙有着某种看似神秘的契合”,因篇幅或内容所限未能解答,留待“下回分解”。2002年出版的《语言全息论》(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就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并基于此建构了“语言全息论”,即运用“宇宙全息律”、“生物全息律”、“系统论”创造性地解释语言的全息性质,通过再范畴化,钱先生揭示了各种语言性质的根源以及存在各种语言理论的理由,即语言与自然大宇宙、人的生

物体等全息同构。

欧洲中世纪的“摩迪斯泰(Modestae)语法学派”曾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大自然的规律与语言内部的规律有一定的联系”,千余年后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钱冠连先生对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和回答,支撑了语言象似性这一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命题,认为语言象似于自然界规律。当然了,这里的“象似”,乃人之所为,是“人”发现的,必须从人本角度才能通达语言之真谛。正如钱先生(2004a:xi)所言:规律不是事物自然地与人“报告”的,是人认识出来的,即规律是人为的一套概念。由此,我们也可推导出:“语言与文化具有全息关系”,“语言象似于人之认知”,这就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有“不谋而合”或“有谋而合”之效。这也使得钱先生的理论建构具有了“整体性”,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形成一个“相互照应、前后连贯”的体系,当为我国学者所记取。

再看钱先生这本专著,从导言篇的立论,到对语言内全息状态,再到语言外全息状态的演绎推理与系统阐发,直到大胆猜想的“预言篇”,都属于“无中生有”的原创性思维,观点鲜明、层次递进、论述流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我建议那些立志创造理论体系的中、青年学者,不妨从方法论的角度读读此书,定会得到某种启示。难怪钱先生曾私下对我说,这本书虽然没得奖,他自己却最喜欢这本书。与他这种个人喜欢相呼应的是,每到一处讲学,将这本书中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人最多,包括我任教的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亦如此。

在此摘录钱先生(2002:9)的一句话概括语言全息论之精髓:“罩在我们头上的宇宙之网,看到了,也想到了。盖在我们头上的语言之网,没看到,也没想到。两张网处处默合着、吻合着、契合着,编织了生命,编织了人生,编织了叫做人的人体。——这便是关于宇宙、人体与语言的一部史诗。”

(4) 语言家园论。钱先生精读了海德格尔(1927)的《存在与时间》(英语版和汉语版),并将其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的居所”修补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从语用学和哲学的角度概括出“三活观——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这就是学界常说的“语言家园论”。

2005年正式出版的《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语用学的范围,进入到语言哲学的高度,具有更为普遍的哲学指导意义——揭示了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状态:人类的生存须臾不可离开语言,语言犹如人类最后的家园,同时紧密结合汉语情景,深入调查常人的语言使用情况,融汉语文化于世界人文研究大潮之中。这既是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进和发展,同时又揭示了语言与人之间唇齿相依的紧

密关系,为“中国后语言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当从人本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才能直抵语言之精髓,这也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完全吻合。

用钱先生(2005:卷首语)的原话来概括本书要义,人正是以“三活观”(即三种基本生活样式)存在着,我们如其所地活着,我们如其所是地是我们自己,我们以言说使世界中的一物(实体或虚体)现身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世上出场或现身。

统观钱先生的四本专著,虽在选材和切入的角度上不同,但若仔细研读,它们具有较大连贯性,可理出其间的理论发展脉络。

第一,这四本都是研究语言理论方面的专著,只不过关注的侧重点和视角不同罢了。《美学语言学》和《汉语文化语用学》着重探讨和揭示了语言和言语本身的结构和使用规律,得出的基本是语言方面的道理,侧重于经验分析,属于语言学理论。《语言全息论》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旨在通过语言看世界的结构(世界是一幅宇宙、人体和语言相统一的、圆融的和谐图景)和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得出的是世界的道理,侧重于理性与思辨,属于语言哲学。

另外,《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可视为《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后续性研究,也是钱先生对语用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语言全息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学语言学》的后续性研究,是对后者提出的语言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有某种神秘契合”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前者强有力的佐证。若说这四本专著有一个连贯发展脉络的话,那便是钱先生从前期的语言学研究走向了语言哲学领域,从经验性分析走向了思辨性研究或理性探索。

第二,贯穿这四部专著的另一个纽带是:钱先生一生所坚守的独树一帜、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研究特点和学术理念,即“重视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立足理论建设,立足母语语料,立足创新”。正是这“一个重视、三个立足”的研究理念使得他的研究风格自成一派,在国内具有特别突显而又重要的地位,得到陈嘉映(2005:11)的高度评价,值得效仿。

3. 论文之立异与前瞻

钱先生近年来共发表论文近百篇,提出的观点立论新颖、与众不同、意义深远。他所论述的语言的递归性、离散性、全息性、美学性、不完备性,他所大力倡导的证伪论之改造、语用推理模式、文化语用学、不完备论、网络言语学、语哲翻译论、语哲修辞论,等等,无不闪烁着真知卓见的光芒,渗透着立新求异的前瞻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论文在若干年之后也不会过时,仍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在论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学外

语教学到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再到叩问中国的外语研究方向,乃至建立中国语言学学派;从理论思辨到教学实践,再到个人的素质培养;从方言分析到普通话,从面相身势、符号学到冗余信息、假信息;从语言学、语用学到哲学,从西方语言哲学到中国后语言哲学,再到中西语哲对比,等等。

钱先生早期是以研究“语用学”成名的,那时他(1995)追随学术前沿,引进并详述了“新格莱斯语用学”理论,叩问其新在何处;还亲自翻译了Verschueren的《语用学诠释》(2003),并著文加以介绍和评述(1990,1991),使得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在我国得以普及和推广。他的研究方法也很具有启发性,如追踪国际著名期刊*Pragmatics*九年的首文研究动态,以便发现语用学的研究规律和发展趋势(2000b)。笔者十几年前读到这篇论文时,就情不自禁地为其叫好,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科研思路啊!对很多学者都有较好的参考意义,我国学者完全可以模仿钱先生的这一独特视角,关注世界某一重要期刊或国内权威核心期刊的首文或首栏论文,将其建成一个封闭语料,以期发现规律性信息。

有了深厚的学术沉淀,再坚守“创新”理念,便可得心应手,下笔有神,游刃有余,精彩纷呈。稍微回顾下一钱先生的近百篇论文,就会发现他在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领军的作用,在发展和创新方面也做出了非凡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他还将语用学理论拓展到翻译、美学、符号学、身势语、文化研究、英汉对比、课堂教学,提出了“汉语文化语用学”、“语用家园论”等观点,为我国上世纪末的语用学研究输送了可贵的养分,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4. 中国外语界的语哲拓荒者

说起“语言哲学”,这或许是西方学者的专利(鲜有学者将中国先秦时期有关语言方面的争论视为语言哲学),但将其引入我国外语界且加以大力推广者,非钱先生莫属。

钱先生早年从事语用学研究,在深入思考的进程中追寻到语用学的语言哲学基础,便一头扎入其中。随后他对语用学进行了哲学溯源,逐渐步入了另一个研究领域,且将其推入高潮——语言哲学,从而进入了人生中的又一新阶段,为我国外语界开拓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世纪之交,钱先生开始发表语言哲学系列论文。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篇语言哲学论文《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一》,分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外国语》1999年第六期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第二篇为《语用学的哲学溯源——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二》,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六期。这标

志着他开始进军语言哲学这一新领域。自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不断地发表了系列语言哲学论文(现已至“之二十”),从而将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推到一个全新的平台,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语言和语言理论,从更深的层次探索语用学和语义学,提出“从语言入,从哲学出”的新思路,为业界学者打开了一个语言和哲学相结合的新窗口!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精读西方语言哲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而且还率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大大充实了我国外语界的科研力量。

5. 心系学界,兼达天下

钱先生既身体力行,也胸怀天下,不仅“独善其身”,且还“兼达天下”,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学者风范。他除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授语言哲学课程,首创在外语界招收语言哲学方向博士生的先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办成了六件利国利民、流芳学界的大事:(1)倡导并成立我国“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2007,现已召开四届年会);(2)每年暑期举办“语言哲学夏日语哲读书院”(2005,现已举办了八届);(3)隔年办“语哲高层论坛”,专题讨论一人或一书(2011和2013两届);(4)创办并定期出版我学会的会刊《语言哲学研究》(2011,现已出两期);(5)督促建立中西语言哲学学会网站,为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6)大力倡导“学贯中西”之原则,努力贯通国内国外的外语界和哲学界。

自此,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已从“单兵训练”进入到“集团军行动”,将“个人爱好、随手阅读”纳入到“有计划、有组织”的正常轨道,从“闭门读书,参悟修行”迈入到“交流相长,互补长短”的新时期。一句话,经过钱先生及其同仁数年的努力,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已逐步迈出了“星火燎原”之初始状态,逐步过渡到“渐趋旺盛,开始坐果”的新阶段,其主要标志如下:(1)每次年会都是国际性会议,云集了国内外、语言和哲学两届学者数百人;(2)每年举办的语哲夏日书院都有一百或二百余人参加,八届共培养千余人;(3)多年的会议、书院、高层论坛已帮助同仁逐步形成了语言哲学知识体系;(4)我国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教学计划中开始设置语哲课程;(5)大力倡导“人品、学品、文品”会风,“以文会友,以学立身”蔚然成风。

钱先生所心系的学界,不局限于外语界,还包括哲学界、汉语界、英汉对比界、逻辑学界等;钱先生所兼达的天下,不仅仅是国内的天下学者,还关注着国际大舞台。他除了结识国内著名语言哲学家之外,还与国际著名语言哲学家往来甚密,如 Maria Baghramian,

Ernest Lepore, Peter Ludlow 等,大有“门泊南粤万里车,窗含西岭千路人”之胸襟。每次他的博士生在毕业答辩时,都会邀请哲学界著名学者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包括陈嘉映、江怡、张志林、朱志方等;学会每开一届年会,每办一届夏日读书院,每开一次专题研讨高层论坛,都要邀请到国内外哲学界专家到场发言、讲话或做报告。经过这数十年的努力,外语界和哲学界、中国与西方的学者不断合作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让同仁们深刻感觉到,我们的研究不仅在推动着国内的学术前沿,同样也在为全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6. 贵在学派意识,志在扬我国威

钱先生一路走来,可谓风尘仆仆,笔耕不辍,火花闪烁,为我国语言理论和语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谈到“贡献”,它可有多重含义,包括很多种类,只要有意义的工作都可谓之“贡献”,但此处所说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指他在十年前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建立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学派”。

钱先生(2004b)曾指出如下一个事实:汉语研究缺乏学派意识,或学派态势不明朗。他认为,所谓的学术成熟、发达与繁荣,其标志就在于“学派纷呈、理论争鸣”,而我国汉语界学者往往陶醉于个案的新分析,偶尔套用一下国外的理论(如用乔姆斯基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如此下去,我国的语言学界何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何以具备向国外同行学派挑战的能力呢?为何不能向理论方向做一点深入思考呢?该文2005年被《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大篇幅转载;后来,其核心段落“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又被教育部蓝皮书,即《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改革报告2005》引用,并强调指出:这些思想“很值得重视,可以作为语言学界发展方向的一种向导”。这样的重视不是偶然的。

钱先生(2007b)认为我国外语界也缺少学派意识。从外语界同行发表的论文来看,虽不乏个别案例新析,但从主流上来看,仍以介绍性和阐释性的“二传手”为主打产品,理论创造虽有涉足,但仍不是我国研究的主流,当然更不消说有学派一事了。他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学派与学派意识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剖析了这一现象。

我国的语言研究,无论是汉语界还是外语界,都存在“缺少我国学派”的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有“流”有“派”,恐怕在主体上也是跟着西方在“流”,跟着西方在“派”。这当然不是在否定同行们的研究和贡献,更无意自贬,但缺乏自己的原创性理论,终究是我们的一块心病。

外语界确有部分学者认为,能把国外学者的理论弄清楚,这本身就很不容易了,谈何创新,这也仅

代表部分学者的观点,不能以偏概全。这些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我们还是十分高兴地看到了一批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成果,如钱先生的《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家园论》等,无不闪烁着创新的火花,为国人树立了从“二道贩子”过渡到“独立原创”的榜样。

钱先生指出,还有些学者更有趣,一方面从国外学者那里道听途说了解到了一些新观点,且将其用于自己的写作中,另一方面却在妄谈这些理论无用。这类讨得便宜还卖乖的同行,何以能成大器?我们既然愿意引用隔壁人家学派的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家不拿出一两件来让隔壁人家也见识见识呢?为什么不认真反思一下自己为何没有理论呢?

钱先生还在文中深刻指出:一个民族的某一门学术领域里根本没有学派是非常不妙的情形。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话语权。这一情形至少表明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处于落后的状态:(1)没有理论意识、学派意识、创新意识;(2)没有认真思考自主、独特的理论模式;(3)没有堪称可挑战国外同行实力的理论;(4)没有后备力量,包括追随者与批评者;(5)没有大学者理应具备的宽容与尊重。

基于此,钱先生还认真分析了外语界无理论创新的心理障碍:(1)甘当二传手:学外语的以引进为主,可让别人去创新;(2)畏难情绪:若要向理论深处探索,又要花不少精力;(3)无新可创:理论已被外人创完,有何值得我等可做?

为此他指出,没有创造出来的理论,比已经创造出来的理论永远多得多;没有说出来的话,比说出来的话永远多得多。中国外语界的聪明人那么多,怎么大多数人就是不把聪明用在创新上呢?把聪明放在跟洋人后面解释而不进行创造性劳动,是对聪明最大、最冤枉、最悲剧性的浪费。著名语言学家张后尘(2004a: V)十分赞赏钱先生的“中国早当培养出自己的大家和学派”的远见,认为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他(2004b)指出,在“促进中国语言学流派的诞生与发展,为创生新理念、新模式、新学说铺路架桥”这一方面,钱先生的美学思想就是其中的一派,可参与世界对话。

钱先生不仅提出了创我语言学派的远大抱负,且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国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2007a)经过反复思索,多方商榷,终于在数年前正式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后语言哲学理论”,意在反思西方语言哲学家之弊,扬国人之长,补西方之不足,且结合中华民族和汉语特点,走“从语言入,从哲学出”的语言研究新路(王寅 2008, 2012)。此乃实践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创新研究理念,努力吸取西语哲丰富营养,“节外生新枝”,在理论上

树立创新意识,走出一条“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新路,以望有朝一日能在语言学理论的国际舞台上扬我国威。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已将这一理论作为本会近十年的奋斗目标,争取团结会内外学者,共同打造我国的语言学新理论,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努力,为建我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7. 语言美和言语美的大师

我与钱先生之间的学术交道已有三十年之久,我不仅为他的才思敏捷、新绪泉涌的高远睿智所动容,更被他的精辟论断、绝妙警句所耳濡目染。钱先生不仅提出了美学语言学理论,而且还是实践语言美和言语美的大师。我阅读了他很多论著,聆听了他很多报告,他既具有深邃的远见卓识,能从细微之处入手发现重要规律,即有“从小处入手,获得大道”的本领,且还文如其人。他在语言表达方面充分实践着他所具有的语言美和言语美的才能,充分体现出如下道理:语言美可让崇高、睿智的思想架上语言翅膀,更深入地飞入读者的心窝。钱先生一辈子妙语连珠,随手拈来,俯拾即是,现偶摘几句,以飨读者。

(1)“摘自己够得着的葡萄。”这显然是在巧妙地反用“摘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以倡导一种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取一切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取得的成果。这也是古人之奋斗精神——虽不能作玉磬以击明堂,也甘愿做瓦钵而奏陋室之现代版,值得我们铭记和效仿。

(2)“为何总要为老外忙乎?”以这样一句通俗的表达来抨击我国语言学界一种怪现象:常套用外国语言学家的理论,换用汉语例子来做研究的习惯路数。这样的论文是在帮助老外论证他们的理论,而抛弃了建立我国语言学理论之宏大目标!若从这一点来说,似有“误国之嫌”!

(3)“自己家里拿出点真货出来,也让隔壁邻居瞧瞧!”巧用“自家”和“邻居”作比,喻说“我国”和“外国”之别,意在鼓励国人认真反思,加紧创新,建立我国自己的语言学派,不要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引进而不创新”之风可休也!

(4)“自带干粮、自背行李。”用以指钱先生所倡导的语言哲学夏日书院活动,主讲人自己出钱交旅馆费,自己出钱买饭吃,免费为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和研究生连续举办了8届(每年暑期举办一届)西方语言哲学培训班。正是由于钱先生的无私奉献,大大推动了我国外语界同仁的语言哲学研究水平,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

(5)“寂寞书房不寂人。”“寂寞”二字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煎熬,所谓的“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枝屋却空”之场景,不免令人生悲。可这对于读书人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生存方式。尽管物理

环境是空荡的、悲凉的、孤独的,但却有丛书相伴,精神世界却是丰富的、滋润的、幸福的!这对于今天的年轻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6)“洋不就,土不成。”生长于中国文化中的华夏子民,无不谙熟“高不就、低不成”这一熟语,是指“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状态。钱先生巧妙地仿拟此语,将其中的“高”和“低”,换用成了“洋”和“土”,来指外语系学生在用母语写作时比不上中文系学生,在用英语写作时又比不上外国人,这便是我国外语系大部分学生基本写作状况的真实写照。

(7)“节外生新枝。”汉语中的成语“节外生枝”原带有贬义,是指“在一个问题之外又岔出了一个新问题”,而钱先生反其道而用之,变贬为褒,添加了一个“新”字,将其仿拟为“在原有理论的节杆上生出新的分支理论”,意在大力倡导理论创新。这一仿拟,妙就妙在一个“新”上,有了这画龙点睛的一字,活灵活现地透出一种“言语美”,将汉语中原有的俗语经过改头换面,巧做安排,竟然能“妙笔生新花”,道出了钱先生一辈子创新问学之道的精髓!

(8)“不能躺在别人的摇篮里,不知道摇篮的编织者。”钱先生这句警言妙句意在提醒人们不要再犯“只见其物,不思其人”的错误,它是用来描写学术界有些人只知道一些表面现象,而不知道其哲学来源的肤浅之人,实属“取水而忘掘井人”在学术界的翻版。例如语言学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原都来自语言哲学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而不少国人,甚至不少外国学者,也未能识得庐山真面貌,难逃“只见摇篮不知编织者”之局限。直言之,若不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语义学和语用学,不能求其源,究其根,所讲授的课程,所写出的文章,话又怎能说到点子上,理又何以道得深。

(9)“为语言找一个圆融的安顿。”这是钱先生为《语言全息论》自做序言的标题,寓意深刻,表达生动,字字珠玑,深入人心,使人难以忘怀。标题中的“圆融”二字意为“圆通”,即语言与宇宙、与世界、与文化、与人类的认知等“密切相通、圆满交融”。好一个“圆”字,好一个“融”字,将语言与宇宙之间的象似关系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安顿”此处为名词,意为“安排妥当和安稳着落的地方”。这一标题意在为语言定位,语言的性质昭然若揭,真可谓一句千钧啊!原来,“语言与宇宙”是处于一种融洽的状态,这才是语言之寓所啊!

(10)“在哲学的摇篮里打了一个滚儿。”国人都知道 Robins(1967:103)的一句至理名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若沿此叙述下去,就是语言学是在哲学家的摇篮里诞生出来的,再往下说一句话,研究语言学的同仁必须具有哲学的功底。钱先生自谦,仅只在这个摇篮里打了一个滚,事实上是打了无数

的滚,洗了若干个澡,花了若干年的功夫!牢牢记住这句话,就会让我们永远记住,学好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钱先生近年又指出:“中国的中文系与外语系学生没经过哲学的前期训练(故言‘学术空缺’)就上阵搞语言研究,那不肤浅才怪呢!”。

钱先生为何能做到驾轻就熟,妙语连珠?用他(2004:282)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于他少年时代就得到了熟读经书的父亲之教诲,浸润于家乡的各类文化活动之中,还受到街头巷尾的儿时游戏的影响,吸取到了地灵人杰的故乡之气韵,养成了他厚德笃学,思维敏捷,语言鲜活的性格。生活质朴和性格开洒自如者,出手的文笔便可带上明快流畅的美学风格,即使是在所谓纯学术论文中也会自然透露出激情与活气,不板起脸孔,也可说出大道理。举重若轻,方显智慧之幽默。这正是中国学者论文里所需要的一种美学风格和气质(钱冠连 2004a: V)。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钱先生把语言哲学的核心“以言辞按住思想,思想锁定在言辞中”归纳为“笔到意渐到,言显意渐显”。且用其来更正时下部分学者所说的“先打好腹稿再动笔”的假象。笔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们往往不是先想清楚了再说,而是在说或写的过程中想清楚了自己的观点。笔者(2013b)故而常将“厚积薄发”改为“边积边发、积中有发、发中有积、以积带发、积发兼之”,以鼓励学人不断写作,在写作中提高。

从那些深刻的立意、清晰的表达、鲜活的语句中,足见钱先生是将许多问题想透彻了!

8. 结语

人生在世,犹若烟云,转瞬即逝,若能在这短暂人生中,历经筚路蓝缕的磨练,饱尝硕果累累之愉悦,摘得如此之多且还沉甸甸的葡萄,收获到如此之丰硕的成果,乃为文人之一生追求,最大幸福!钱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从无到有,人有我新”的创造性问学之道,实为我国学者中的佼佼者。像钱先生这样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立志创新的拓荒者、思想者,在我国外语界少之又少!

我们坚信:有一份耕耘,必有一份收获。用心血浇灌的花,自然绽放得更加灿烂!

附注

① 摘自钱冠连先生诗句。

参考文献

- Robins, R. H.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陈嘉映. 2005. 序 3[A].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3-28, 63. (下转 76 页)

《当代外语研究》庆贺钱冠连先生 75 华诞专号

（总第 402 期）作者感言摘录：

以钱先生为代表的外语学人在外语界力倡语言哲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仅在中国传播了语言哲学，推动了中国语言哲学研究，更能促进中国的哲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黄斌：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钱先生是中国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的领航者。先生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笃定持守的学术信念在语言学之外拓疆辟土，筚路蓝缕，引领一代学人进入新的学术殿堂，一睹语言哲学的堂奥。先生淡泊清逸的学养品格濡染与浸润了许多像我一样的语言哲学爱好者。先生创建的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更是成为大家的精神家园，嘉惠我者甚多。

——聂大海：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钱冠连教授是学界大师，我国语用学、语言哲学和美学语言学研究的前驱者，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钱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眼光犀利，观察深入，富于创新精神，乐于扶持后学，其人品和学品乃吾辈之楷模！

——文旭：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师虽然鼓励我斗胆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中去探索，毫无保留地支持、指导我的研究，但在这超大胆的“不规矩”背后，他却如履薄冰般严守着为学的规矩！老师博大

的学术胸怀、强烈的创新意识，加上求真务实、严谨不怠的为学态度，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规矩、不规矩，对立的两极在老师那里天然和谐地统一；为师之境界尚有胜此者乎？

——刘利民：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很幸运，能有机会与他相处了那么多的时光，真切地感受到他那渊博的学问和绝世独立的人格魅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钱教授都堪为我们的楷模。

——覃修桂：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

钱冠连先生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讲座得意之时，会手舞足蹈；动情之处，也会泪洒会场。记得他曾说过人品与学品成正比，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他都是一个严谨的人。

——梁瑞清：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导师心中的创新不是上述的后续性创新，而是要在充分理解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是一种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创新和创造。

——霍永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我眼里，先生的著述（四部学术专著、两部散文集）无一不是在言说真知。……这些思想体系，若称为“大气大为”，一点不过分。其“大气”在于“民间”与“学院”、“东

方”与“西方”、“古代”与“当代”在其著述中被搭建与融合；其“大为”在于在搭建和融合的基础上有推陈出新，每一个思想体系都新颖而深刻，有超出一般见解的高度和价值，思想体系之间又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一以贯通，这是对“真知”的把握。……先生是那种常低头沉思的人，在我眼里，先生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反思，这已成了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爱好。

——王爱华：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真名士真为学，为真学得真乐；老师这般为学生生活，就是学生的梦想。

——褚修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作为国内外语界里从事语用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者，钱先生被公认为是一面旗帜。在他的带领下，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成晓光：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跟钱冠连教授交往，我对他的直观感受是：朴实如绵绵秋水——对世事，对后学，率真清澈；视野似浩浩鸿鹄——对学问，对事业，执着高远。

——彭宣维：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

钱冠连先生学术影存



青年钱冠连



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钱老在课堂上



与俄罗斯语言学家耿华合影



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五人合影，从
左至右隋然、钱冠连、王寅、林允清、李洪儒



与陈嘉映先生合影



与刘利民合影



与梁瑞清合影



与霍永寿合影



与褚修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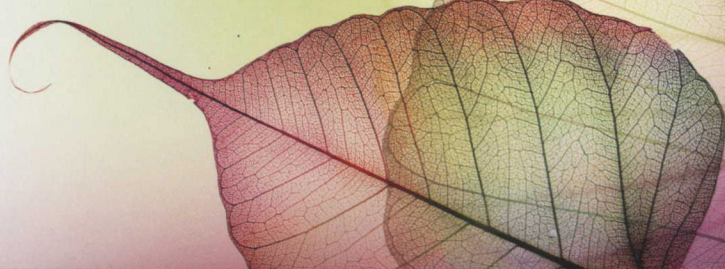
与王爱华合影



与张后生合影



与杨枫主编合影



大家评钱冠连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中有)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

博大精深 大家风范

我觉得钱冠连教授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几个鲜明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特点:

一是“业精于勤”，学术上不断奋进。

二是“行成于思”，善于开动机器，勇于开拓。

三是笔耕不已，激扬文字。

——考美林(1997)

一胡壮麟

勤奋耕耘著作颇丰

求真求实一介书生

——桂诗春(2013)

——刘润清(2014)

在西方哲学中，钱先生似乎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最深，不过（他）有自己的心得与推进。

——陈嘉映(2005)

(钱冠连“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一文)产生较大反响。《光明日报》连续发表语言学者的文章，认为此文的论说“很值得重视”，“学派不盛不仅是语言学界的现实，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现实”。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2005》(305-323页)

……他是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他纯粹地做学问，不为时风动，不受名利累。……他有个性，但不顽固；有热情，但不张狂；有才气，但不孤傲，且年纪越大越是反思自己的不足。……感谢他为教育阐释的平凡与不朽，感谢他为生活创造的意义，感谢他智者的胸怀。

——徐真华(2014)

钱冠连先生在我国语言学界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堪称我国外语界的“理论拓荒者”。……这些论文在若干年之后也不会过时，仍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是中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拓荒者。……钱先生的《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论》等，为国人树立了“独立原创”的榜样。……他是语言美和言语美的大师。……钱先生是立志创新的拓荒者、思想者。

——王寅(2014)

钱冠连把思考的智慧种子播撒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催生出累累果实。……钱冠连为推动我国此学科[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引领性贡献。他的……创新意识可谓是一次思想认识的解放。……做学问永不忘生产知识，也生产了新知识。他努力做一位生产知识的先进工作者。

——王初明(2014)

当代外语研究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月刊)

2014年第06期 (总第402期)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

编辑出版 《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

邮编 200240

主编 杨枫

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日期 每月28日

Editor Editorial Office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Address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95 Website www.ddwyyj.com

Email ddwyyj@sjtu.edu.cn

Editor-in-Chief YANG Feng

Printer Printing Company Ltd.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Distributor Shanghai Bureau of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 号 ISSN 1674-8921 CN31-2039/H

邮局代号 国内 4-303 国外 C3185

定 价 10.00元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局